

生命与精神的自身运动: 分析与综合统一的本体基础^{*}

孙利天 张岩磊

摘要: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 把分析与综合的统一作为重要的辩证思维方法。通常把分析理解为把事物整体分解、区分为各个组成部分, 精细地认识和规定它们的性质、特点和功能; 把综合理解为对事物组成部分精细认识基础上整合、综合成整体的认识。如此理解分析和综合是一种典型的知性思维方式, 并不能真正教给人们辩证思维。我们认为哲学意义上的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是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辩证统一, 而生命与精神的自身运动是分析与综合统一的本体基础。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不同程度纵欲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 分析与综合统一的精神成长的辩证法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分析; 综合; 生命与精神; 辩证统一

中图分类号: B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2)01-0118-06

作者简介: 孙利天,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岩磊,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吉林 长春 130012)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 把分析与综合的统一作为重要的辩证思维方法。我们把分析理解为把事物整体分解、区分为各个组成部分, 精细地认识和规定它们的性质、特点和功能; 把综合理解为对事物组成部分精细认识基础上整合、综合成整体的认识。对分析与综合的这样一种理解不仅具有思维操作的意义, 也有着实践日常生活的意义, 这种操作性的理解还符合人们的日常经验, 对于避免认识的片面性有积极意义。但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理解过于接近常识, 人们很难领会到它的哲学意义。在我们看来, 如此理解分析和综合是一种极端的、典型的知性思维方式, 并不能真正教给人们辩证思维。并且如果仅仅把分析和综合做这样的理解, 显然还没有进入到分析和综合这两个概念在西方学术语言中所具有的逻辑意义, 更谈不上在哲学的层面上实现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

一、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及其逻辑意义

在西方哲学史上, 分析与综合的区分由来已久,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理念论、回忆说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分析的传统, 而亚里士多德对理念论的批

收稿日期: 2011-10-27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项目批准号: 10&ZD066)的阶段性成果。

评、实体与属性划分则奠定了综合的传统。后来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甚而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也正是基于此两种路向。经过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洛克、贝克莱一直到休谟和康德, 分析与综合最终在西方哲学史上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规范的逻辑意义。

从休谟开始, 分析和综合主要是指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 相应地, 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就应该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如何统一的真实的哲学问题, 而不是日常思维操作中的分解和综合。按照休谟的理解, 知识是由命题组成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对应的是观念关系的知识和事实的知识, 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知识。休谟有一段旗帜鲜明的话 “当我们巡视图书馆时, 我们可以拿起一本书, 例如神学或经院哲学的书, 我们就可以问: 其中包含着量或数方面的任何抽象论证么? 其中包含着有关事实与存在的任何经验论证么? 没有, 那我们就可以将它投到烈火中去, 因为它所包含的, 没有别的东西, 只有诡辩和幻想。”^① 休谟的这种表述可能已经非常接近后来维也纳小组逻辑经验主义的表述。我们知道, 休谟对康德有很大的影响。康德自己的说法, 休谟的怀疑论把他从独断论中唤醒。按照康德的看法, 所谓分析和综合的区分, 是建立在主词和宾词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中, 康德明确地提出了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别。“在一切判断中, 从其中主词对谓词的关系来考虑, 这种关系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类型。要么是谓词 B 属于主词 A, 是 (隐蔽地) 包含在 A 这个概念中的东西; 要么是 B 完全外在于概念 A, 虽然它与概念 A 有连结。在前一种情况下我把这判断叫作分析的, 在第二种情况下则称为综合的。”^② 康德举例说 “物体是有广延的” 是分析命题, 因为物体的概念包含广延的规定, 所以该命题只是把包含在主词中的广延性从物体概念中分析出来, 它的真不依赖经验, 因而是逻辑真理。而当说 “物体是有重量的” 则是综合命题, 因为在物体的概念中并不直接包含重量的规定, 只有通过经验把主词 “物体” 和宾词 “重量” 联系起来, 所以, 这个命题是经验命题, 它的真假需要经验检验。我们认为, 康德对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基本沿袭了休谟。简单地说, 分析命题是逻辑命题, 综合命题是经验命题, 这也是一直到当代西方哲学中对分析和综合的基本规定。而正是这一基本规定被奎因认为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教条。

我们知道, 奎因在著名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批判了分析和综合相区分的教条, 从而实现了逻辑实用主义的转向。奎因从语言哲学出发, 认为 “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和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别”^③ 是影响现代经验论的一个教条。这一批评直接针对康德对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分。奎因指出, “康德把分析陈述设想为一个这样的陈述, 它把恰恰是主词内涵中已经包含的东西归属于主词。这个定义有两个缺点: 它局限于主 - 谓词形式的陈述, 而且求助于一个停留在隐喻水平上的包含概念”^④。康德对于 “物体是有广延的”、“物体是有重量的” 这两个命题的区分是建立在主 - 谓词间的包含关系基础上的。康德的表述非常清楚, “因为在我去经验之前, 我已经在这个概念中有了作出这个判断的一切条件, 我只是从该概念中按照矛盾律抽出这一谓词, 并借此同时就能意识到这个判断的必然性, 它是经验永远也不会告诉我的。与此相反, 尽管我在一般物体的概念中根本没有包括进重量这一谓词, 那个概念毕竟通过经验的某个部分表示了一个经验对象, 所以我还可以在这个部分之上再加上同一个经验的另外一些部分, 作为隶属于该对象的东西”^⑤。而康德在这里并没有继续追问, 为什么 “广延” 已然 “隐含” 于 “物体” 这一概念中, 而 “重量” 则需要经验才能附加于 “物体” 之上呢? 主词包含谓词, 什么情况下包含, 什么情况下不包含? 奎因认为这

①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 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 第 670 页; 转引自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 第 228 页。

② [德]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邓晓芒译,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8 页。

③ [美] 奎因 《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 载 A. P. 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 牟博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第 39、40 页。

④ [美] 奎因 《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 载 A. P. 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 牟博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第 39、40 页。

⑤ [德]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9 页。

是停留在隐喻水平上的包含关系上面的。我们认为, 所谓隐喻水平上的包含关系正是一种模糊的包含关系。奎因正是通过对主-谓词间的模糊包含关系的揭示, 一定程度上消解掉了分析与综合命题的划分并进一步消解掉了所谓分析的同性命题, 从而动摇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 甚至可以看做是对整个分析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摧毁。

在我们看来, 康德之所以认为“物体”概念先天性地包含着“广延”属性而不包含“重量”属性是源自西方哲学隐含着的视觉中心主义立场。广延性是可以在物体的概念中直观到的, 可以看出来的, 而重量则不能被直观出来, 需要用手掂一掂才能经验到。对于西方哲学, 德里达后来明确地使用视觉中心主义的哲学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模仿奎因的说法, 把视觉中心主义看做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隐含的教条。

二、分析与综合的统一

通过上文的分析, 西方哲学史上分析和综合作为不同命题的区分由来已久, 而且构成了分析哲学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前提。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逻辑理由很简单, 形而上学命题既不是分析命题, 也不是可由经验证实或证伪的综合命题, 所以是无意义的假命题。分析和综合的区分也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是分析哲学的理论前提, 而奎因对这个前提的质疑和批评导致了分析哲学后来的一些转向和变化。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西方哲学中分析与综合、逻辑与经验的区分, 也许真的没有奎因所说的分析的同性命题, 但是人类知识中的命题或判断肯定有不同抽象程度的相对区分, 通俗地说有些命题接近经验, 有些命题则离经验很远, 更接近纯粹的思维形式。更重要的是, 西方哲学中分析和综合相区分的“教条”由来已久, 它是逻辑经验主义和分析哲学等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石。即便对于奎因所揭示的康德对于分析与综合命题建立在主谓词间“隐喻的包含水平”上的划分, 我们至少可以视之为一种有意义的“约定”。所以我们不妨暂且相信这个教条,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能不能统一、如何统一的问题。

我们知道, 休谟以其经验主义知识论区分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 通过对因果关系的怀疑动摇了经验科学的基础, 并且把神学和经院哲学排除在知识之外, 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拒斥形而上学的始作俑者。康德延续休谟的思路进一步通过主-谓词的包含关系明确地区分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 但康德并没有单纯坚持经验主义, 他的批判哲学的目标是要综合经验论和唯理论, 为哲学进一步清理地基或者说重新奠基从而拯救传统形而上学。

为了统一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 康德提出了“先天综合命题”, 力图寻求综合命题即后天经验命题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也即经验的根据),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他的先验哲学体系从而实现他所谓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从而, “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 是康德统一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关键, 用康德自己的话说, 则是“纯粹理性的总课题”。综合命题固然是通过后天经验才得来的, 然而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经验却是源自我们先天的感性能力和知性统觉的能力。康德通过先验的演绎证明了经验之所以可能且具有客观必然性首先是因为我们所具备的先天的纯直观: 时间和空间, 其次是因为我们所具备的纯粹知性概念即先验范畴。这样, 后天的综合命题便同时具备了分析命题才具有的客观必然性, 所谓“先天综合判断”成为可能, 从而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就这样被成功地统一了起来。但是康德对分析与综合命题的统一却是建立在知性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的。康德著名的“二律背反”揭示的是理性或知性的运用不能超出经验的领域否则会因为缺乏经验的依据而陷于悖论, 于是康德把知识限定在现象领域, 而诸如上帝、灵魂、实体这样的“物自体”则是不可知的。也即康德的整个先验哲学是建立在悬设或说约定“物自体”的基础上的。通俗地说, 知识之所以可靠只是因为人的先天认识模式是先天的、先验的。进一步说, 知识是什么是由“人是什么”所决定的。至于物质实体本身、上帝、灵魂等, 在康德认识论的领域内是存而不论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先天综合判断”从根本上说仍是一种分析的判断。因为在康德看来,一方面“在一切判断中,从其中主词对谓词的关系来考虑,这种关系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类型。要么是谓词B属于主词A,是(隐蔽地)包含在A这个概念中的东西;要么是B完全外在于概念A,虽然它与概念A有连结。在前一种情况下我把这判断叫作分析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则称为综合的。”^①,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矛盾律是一切分析性的知识的一条普遍的、完全充分的原则……”^②所以,一切“先天综合判断”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人的先天的认识模式的先在的规定性,从而“人的先验的认识模式”是最根本的主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作为谓词当然要包含在主词之中,因而也不可能与主词矛盾。一句话,综合得以可能的前提恰恰是分析的先天规定性。所以在康德先验哲学体系下,分析与综合命题的统一还只是知性的主观形式同一而非辩证的客观内容统一。用黑格尔的批评是,“它把认识的活动当作不过是片面的建立,在这个建立的彼岸,仍然隐藏着自在之物”^③。康德的分析与综合的统一仅仅是“片面的建立”,而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问题还需由康德进一步召唤出黑格尔。所以我们得另辟思路,像黑格尔那样,借由辩证法来思考一下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统一的问题。

黑格尔不再仅仅按照主-谓词间的包含关系来区分分析与综合,而是肯定把事物整体分解开来加以精确认知的这样一种分析和作为一个整体认识的综合具有的认识意义,而且明确地把认识分为“分析的认识”与“综合的认识”。相应地把认识的方法分为“分析的方法”和“综合的方法”。黑格尔看来,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区分辨析意义的分析和综合概括意义的综合实际是思维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向。我们通常所说的把事物整体分解开来区分、辨析的这种分析,黑格尔认为是思维的给予性,是面对现成的意识内容和经验内容,而黑格尔所理解的综合,他把它看作是思维能动的规定性,是对给予性的经验内容进行抽象概括思维能动性的规定,把分析理解为受动性、给予性,把综合理解为能动的概括,这是黑格尔在认识论领域所理解的分析 and 综合的涵义。

黑格尔最为重视分析与综合的统一问题。所以虽然他肯定在思维操作意义上对分析与综合的区分的认识意义,但是他却反对仅仅在知性层面上理解分析与综合。黑格尔曾批评道,“许多人说,认识作用除了将当前给予的具体对象析碎成许多抽象的成分,并将这些成分孤立起来观察之外,没有别的工作可做。但我们立即可以明白看见,这未免把事物弄颠倒了,会使得那要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的认识作用陷于自身矛盾。……用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葱已不在了。”^④对黑格尔来说,思维不只有抽象的作用或只具有形式同一性的意义。因此分析与综合的统一绝不是分析的方法与综合的方法知性的简单相加或思想操作上的交互运用,当然也不是康德的先验筹划。而是辩证法的一体两面,其辩证的统一才能达到概念之整体即存在之真理。所以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不论是在《小逻辑》还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逻辑》中,黑格尔都把分析和综合的统一看作是辩证法的本质特征。“绝对的认识方法完全单独地在其开始的普遍的东西里,找到它的以后的规定,这个方法就是概念的绝对客观性,是这个客观性的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方法便是分析的。——但当它的对象被直接规定为单纯的、普遍的东西,通过对象在其直接性和普遍性中所具有规定性而显露自身为一个他物时,这个方法又同样是综合的。……这个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判断的环节,通过它,那开始的普遍的东西从自身中把自身规定为自己的他物,它应该叫做辩证的环节。”^⑤不仅如此,黑格尔甚至用分析和综合的统一贯通逻辑学的全部环节。简单说来,从逻辑学的起点看,存在论诸范畴既是

① [德]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47页。

② [德]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47页。

③ [德]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88页。

④ [德] 黑格尔 《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3页。

⑤ [德]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37页。

直接给予的, 人的认识对它只能静观和分析, 同时这些范畴又是概括的综合的认识, 所以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从逻辑范畴的自身进展说, 每一范畴的自身区分和自我否定而形成的判断, 是范畴或概念自身潜在的丰富性的展开, 因而是与概念同一的, 判断是分析的、必然的判断, 但因为分析而成的新范畴自身的规定尚未展开, 所以, 判断也是概括的、综合的。当逻辑范畴达于绝对理念的认识时, 两种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得到全部实现, 认识的给予性、直接性与反思的构建性和能动性, 理念的自身区分和统一等, 都达于真正的辩证统一, 从而表明辩证法是生命和精神自身运动的灵魂。

三、分析与综合统一的本体基础

黑格尔用思辨的语言所论述的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有些晦涩难懂, 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理论本身的晦涩, 这种“既是……又是……”的辩证法的招牌句式的确可令那些只持形式逻辑思维的人感觉难以理解; 另一方面是因为理解黑格尔总要进入他那无与伦比的集大成之哲学体系。对黑格尔来说, 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不仅仅就是认识论的问题。在黑格尔那里, 辩证法、逻辑学、本体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 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①辩证法不是外在的知性思想操作, 而是引导、决定“概念-存在”发展自身、最终生成绝对理念的那个活生生的“我思”。在这里, 黑格尔实际上已经鲜明的向我们表明, 生命原则是理解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甚而是理解其整个哲学体系的根本原则。在这样的意义上, 生命与精神的自身运动就是分析与综合统一的本体基础。正是生命与精神的自身运动赋予了分析与综合统一的内在可能性。基于此我们才能理解黑格尔那“伟大的历史感”、那螺旋上升的圆圈。

如此一来, 如果我们回到自己的生命和精神本身, 辩证法的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就是非常容易明白的道理。辩证法不是形式逻辑而是内容逻辑、生命逻辑。比如, 恩格斯认为, 生命有机体每一瞬间都有一些细胞在生成, 一些细胞在死亡。在每一瞬间, 它既是它, 又不是它, 所以, 它既与自身同一, 又与自身区别, 这是令许多哲学家困惑的 A 等于 A , A 又不等于 A 的形式表述。进一步, 如果不囿于黑格尔所说有限认识或知性思维的同一律的框子, 生命本身就是如此辩证。生命自己运动的自身差异、自己区分, 是生命有机体潜在规定的自我实现, 所以是与自身统一的, 是分析的运动; 生命有机体在自身运动中不断吸取整合自己的丰富规定性, 以形成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经验差别, 自我区分的统一也可以说是生命的综合运动。至于我们的精神发展由于有了自我意识和目的等能力, 其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就更加明白易解。伴随着人的自然生命的精神成长和发展既是社会化、普遍化的过程, 也是特殊化和个性化的过程。如此, 我们的生命与精神的自身运动, 当然就是既是分析的过程, 同时又是综合的过程。

当然, 作为哲学家的黑格尔难免有哲学精神的偏好, 他更看重个人的理性、普遍性, 把个人看作是绝对理念实现自身的环节和载体, 这受到新的时代精神的厌恶和拒斥, 也因此反叛黑格尔成为 20 世纪哲学的起点。但是, 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不同程度纵欲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 黑格尔分析与综合统一的精神成长的辩证法反倒显示出它特殊重要的意义。当代人大都关注自我和个性, 这是自我等于自我的同一性或分析性。但是, 自我作为精神是潜在包含无限丰富性和可能性的自我, 只有在自我的分析运动中充分实现这些丰富性和可能性, 即所谓日新又新, 新新不已的造就新我, 才是辩证的自我同一。固执于既有自我的欲望、享乐和成就等等, 是知性的自我同一, 是精神生命的死亡。所以有无精神成长的思想维度, 有无否定自己、超越自己的精神向往, 也可以说有无辩证的自我分析, 对每个人特别是青年人说至关重要。精神成长的过程也是自我综合、自我统一的过程。日新又新, 总是要在否定、超越当下之我的前提下把自我规定为一个他我, 而这个他我终又通过自我意识而复归于或者说综合、统一为一个新的自我。因而就个体的

^① [德] 黑格尔 《小逻辑》, 贺麟译,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第 427 页。

生命与精神的自身运动、自我成长来说, 这是一个分析与综合辩证统一的过程。也因此, 人的生命才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 人们的自我认同也出现了危机。后现代主义哲学所说的“碎片化”、“人之死”和“非人”等, 表现了现代人自我精神统一性、自我意识统一性的丧失。这不仅因为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 也不仅因为现代社会日益强化的规训和惩罚, 或者海德格尔所说技术“支架”的操纵和控制, 可能也因为人们对自我的过于执著和迷恋, 失去了人类精神普遍性维度的思想力量。自我不是抽象的封闭的自身同一的单子, 而是历史中、社会中具体的自我, 因而自我精神的概括和综合终究离不开公共性的思想范畴和语言, 甚至也需要黑格尔和马克思式的人类理性目的对个人精神的贯通。

(责任编辑: 周小玲)

The Self Movement of Life and Spirit: the Ontology Foundation of the Unity of Analysis and Synthesis

Sun Litian Zhang Yanlei

Abstract: The unity of analysis and synthesis is a kind of very important dialectical thinking method in the Philosophy Principle Textbooks. Generally, analysis is thought to decompose and distinguish the whole thing for each component, and then, know and set their properties,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subtly. Synthesis is thought to be a kind of knowledge which combines the whole thing based on the subtle knowledge of each component. But the understanding of analysis and synthesis is a typical intellectual way of thinking which cannot offer dialectical thinking. In our opinion, the unity of analysis and synthesis in philosophy i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analytic proposition and synthetic proposition, and the self movement of life and spirit is the ontology foundation of the unity of analysis and synthesis. Today, individualism, liberalism and varied hedonism are wide spread, and dialectics about spiritual growth of the unity of analysis and synthesis has special important significance.

Keywords: Analysis; Synthesis; Life and Spirit; Dialectical Unity